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 主编

日伪
“治安强化运动”
研究

江 沛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

(1941 ~ 1942)

江 沛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 / 江沛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4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 李喜所主编)

ISBN 7-310-02376-5

I. 日... II. 江... III. 治安强化—研究
IV. K26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240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78 千字

定价:21.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导 言

1940年，德国在吞并法国实现其对欧洲大陆的控制后，又展开了对苏联的作战；在远东地区，陷于中国战场泥淖的日本，曾屡次与国民政府进行外交接触试图迅速结束在中国的战争而无果，此时却受德国胜利的刺激，放弃了对华谈判和北进苏联的策略，选择了南下与美、英争霸太平洋的战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此进入了最为艰苦、最为关键的岁月。

1941~1942年，为支持日军在太平洋与南亚地区的作战，把华北区域变为日军稳定的兵站与能源供应基地，在日本军部全局协调及布置下，日本华北方面军与伪政权共同在华北区域实施了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以下简称“治强运动”或“治运”）。这场运动是日军及伪政权在华北地区（以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辖区为限）进行的一场旨在彻底消除以中共为主的抵抗力量威胁，稳定统治秩序，强化经济掠夺，并重视综合运用政治、军事与文化诸手段的大规模行动。其具体部署为：在“治安区”或“半治安区”的各个城镇，以伪政权为主进行大规模的“强化治安”，包括户口登记、清查往来人口、实行食品配售、对外经济封锁、组织自卫团队、宣传“皇道乐土”等内容；在“非治安区”，实施以“烬灭作战”（即“三光作战”）为指导政策的大“扫荡”，包括“烬灭作战”、“囚笼政策”、“集家并村”等措施。这一行动虽然只持续了两年，但其既是对日军前期华北占领政策的修正与系统化，其政策也在此后的日伪华北统治政策中得到了延续，“治强

运动”的实施，对华北区域的战争态势乃至整个中日战争形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华北区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及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均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平原根据地几乎完全丧失，日伪政权统治的所谓“治安区”得到巩固，“半治安区”急剧扩大，华北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和困难的时期，中国抗日战争的声势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直至1943年，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局势的转变，日军将华北区域的部分主力师团南调作战，日伪不得不结束了“治强运动”，整个华北战场的抗战局势才开始有所好转。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发生在抗战中期并对华北沦陷区、八路军部队及各抗日根据地均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整个中日战争走势也产生重要影响的华北日伪“治强运动”，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抗日战争史学界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深入研究，至今未有一部相关的研究专著问世；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NKI）的检索可知，1994~2004年的11年间，相关研究论文只有5篇。在已有成果中，探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军与中共或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队间军事斗争的多，分析日伪政权对各地城市、乡村民众的剥削压迫、残酷杀害事实的多，而对于这一运动产生的背景、具体运作过程、基本特点及对华北抗战乃至整个中日战争的意义分析得不够，值得再探讨的地方仍然不少。在考察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的艰苦及困难时，一些研究成果对导致这一艰苦局势的重要根源——多侧重于中共及八路军部队是如何抗击日伪“治强运动”的，对日伪政权通过实施五次“治强运动”所体现出的统治策略转变视而不见，对“治运”期间日伪政策产生的效果阐述不够充分，使人难以真正理解这一时期华北抗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究竟由何而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暴行时，认为中国史学界谴责日军在华北各地“扫荡”中的“三光政策”纯属子虚乌有，我们在对其无视历史事实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史学界对这一时期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研究极其薄弱，没有挖掘充分

的证据、没有进行细致的口述记录，也没有对日军暴行进行综合的、扎实的研究，不少记载仍停留在揭露、批判的层次上。因此，进一步深化对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探讨，对于研究抗日战争史、分析日伪军事进攻与占领的基本特征、揭露日军在华暴行、考察日伪统治策略对沦陷区社会演变的影响，总结历史教训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对这一课题的分析与研究，在当时八路军中即已展开，目的在于摸索日伪政权实施“治强运动”的基本规律，找到相应的对策。这些成果散见于如《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以及各根据地八路军高级将领的汇报与讲话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外有关中日战争及华北抗战史的研究中，均将华北“治强运动”视为日伪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与活动，并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资料刊布以及专题的研究成果却不是很多（见附录），无论是其整体还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均具有再探讨的价值及可能性。在资料方面，最有价值的是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辑出版的《华北治安战》^①，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资料集^②，华北诸省市出版的有关日军侵华各地资料中涉及“治安强化运动”部分，如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上下）也已相继出版^③。华北区域数省的档案馆所藏的敌伪档案全宗里，均有大量相关资料，现已对外开放，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宝库。

本书利用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档案馆以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山西省、天津市图书馆所藏的地方文献档案与日文资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治安强化运动”的起因、日本侵

①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③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年版。

华政策结构性调整后的态势，基本理清以往较少阐述的“治安强化运动”的来龙去脉，较为清楚地分述了“治强运动”期间日伪政权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诸方面的作为，对以往较少涉及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敌我双方的心态变化也做出了尝试性的评述，还对日伪政权统治政策调整后在华北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在江南地区展开的“清乡”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以观照“治安强化运动”在华北乃至整个中日战争态势中的地位及影响。

本书共分十章，有两个附录。现将各章内容摘要综述如下：

第一章：研究的前提。本章主要介绍了笔者对日伪政权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定义，目前有关此课题研究的国内外学术概况，本书在前人基础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价值所在。

笔者以为，1941~1942年间，日伪政权在华北区域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是在中日战争进行到至为重要的相持阶段，日军在开辟太平洋战场前后在政治、军事上的重大决策。这一措施，在华北地区先称为“强化治安运动”，有时也称“清乡”运动，但最终统一称为“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地区则称为“清乡”运动。这一举措的目的，旨在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综合手段，稳定日伪政权在两个区域的统治，彻底击垮以中共为主体的抵抗力量，扩大对上述地区的矿产、农业、工业资源的掠夺，以支援太平洋战场和日本国内急需，逐步实施对民众的奴化教育，以达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

第二章：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当时的认识与以往的研究，都把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视为引发日伪政权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因素。笔者在翻阅大量资料后认为，“治安强化运动”是日本政府及军部一系列对华政策和太平洋区域整体作战计划调整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政府及军部维持本土、伪满洲国及太平洋战争战略需要的必要步骤。在促使日伪政权作出展开“治安强化运动”决策的诸多因素中，百团大战只是一个偶然巧合而非决定性的因素。

第三章：“治运”过程概述。本章主要综述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间日伪政权发起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与基本概况。由于以往没有研究华北区域“治安强化运动”的专著，有限的研究成果不够深入，不少相关论著在涉及“治安强化运动”时，虽然都认为其具有影响华北战局的重要意义，也给予其必要的地位，但多以概括性描述对之，对其基本过程的描述更是语焉不详。笔者以为，虽然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也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但每次又有不同的战略目标，达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从整体研究考虑，在此阐述“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过程尚有必要。

第四章：“军事战”：扩大“治安区”。本章通过对日伪军事“讨伐”与“扫荡”以中共为主的华北抵抗力量的描述，概述了五次“治运”期间日伪军实施“烬灭作战”、“集家并村”、“囚笼政策”的原由、过程及危害，并对由此造成的华北区域社会动荡及民众苦难进行了简明阐述。在各个目次里，通过运用各地的档案资料，对“治运”期间日伪军的施虐暴行，留下了清晰、准确、不容置疑的记载。

第五章：“政治战”：巩固“治安区”。“政治战”是日语名词，意即谓在华北各地的地方政治管理上，同样要像军事作战一样全力对付中共及其他抵抗力量。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政权在各地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大力推行“政治战”，主要内容是实施日伪政权统治下的所谓“自治”，它套用传统的保甲制度，建立县以下“自治”的乡村管理体制，其“连坐法”的手段也渗透着军事管制的暴力特征；日伪政权大力扩展县及村级的民间团体，以强化县及县以下乡村的管理；此外，日伪政权还极力扩充并训练自卫团（队），以“清剿”中共地方基层组织、武装及其他抗日力量。

第六章：“经济战”：经济控制与资源掠夺。1939年底，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殖民掠夺体制已基本确立，其首要统制和掠夺的是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产业和煤、铁、盐、棉等重要资源产业。从1941年至1943年7月止，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控制与掠夺，就是这一根本方略的

具体实施。从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起，日伪政权就把对中共各根据地及其他中国抵抗力量进行“经济战”，视作“治运”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近乎残酷的经济封锁的同时，日伪政权又全力以赴地增加生产、掠夺资源，以扰乱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金融与财政运作；以招募和直接抓捕的方式，将大批青壮年劳力运赴伪满洲国及日本国内充作各种苦役；以合作社的形式直接控制市场与民众日常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都是为完成日本大本营交付的援助伪满洲国、支援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国内经济运行任务所采取的步骤，代价是华北区域的经济无序、恶化与民众生活的苦难。

第七章：“思想战”：文化与教育的奴化。在持久的民族战争中，对民众的心理与思想的争夺，是军事作战外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人深知，作为中日战争的始作俑者，文化隔阂与异族仇恨是他们统治稳定的天然障碍。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及中日战争爆发后抗战文化宣传下的各地民众，大大增强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对日伪政权的敌视造成了日伪统治缺乏起码的民众基础，自然困难重重。日本展开奴化宣传的重点就是，中日同属黄种人，欧美白种人才是共同的敌人，中国只有停止抵抗，与日伪政权合作，共建黄种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能实现所谓“皇道乐土”的理想。然而因其野蛮的政治与军事统治所引发的民众的普遍仇视，这一基于种族主义的“思想战”宣传效果，也令日伪政权大失所望。

第八章：“治运”与“清乡”比较。以往的相关研究，在涉及华北区域“治安强化运动”时，常把它局限在华北区域内进行考察，在“治运”与其他区域日伪政权相关政策间缺乏关联性思考，更缺少将其置于日本侵华总策略方针下进行探讨的大视野。其实同一时期，华中日军与汪伪政权也在进行所谓“清乡”运动，“治运”与“清乡”运动间的相似与迥异，两者间的有机关联是非常重要的。两者的比较研究，是考察这一时期日伪统治策略变动的重要视角。

第九章：诸种心态的观照。战争文化下的心态史，关注的是战争

文化影响下的不同群体明显或潜在的心理变化与异常，是历史心理学兴起后开始被引入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引人关注的切入点。本章尝试利用已有的零碎资料，对五次“治安运动”期间日军官兵、伪职人员、敌后中国士兵及受战争影响平民的各方心态作一初步的描述。

结语：1941~1942年间，日伪政权发动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中日战争在极为关键的相持阶段日本大本营对华战略决策结构性调整的产物。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策动下，日伪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展开了一场“总力战”，旨在彻底摧毁以中共和敌后国民党军为主的华北各抵抗力量，以达到将华北变成稳定的兵站与资源供应基地的战略目标。经过两年的激烈斗争，日伪政权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同时，也使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根据地及八路军、敌后国民党军等抵抗力量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华北各地的经济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日本国内和太平洋战场。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日伪政权部分实现了其战略构想。然而，中共及其他抵抗力量并没有在五次“治运”中被消灭，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生存的条件并顽强坚持斗争，有效牵制着30万左右的日军与数万伪军，支援了中国其他地区及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华北区域各地民众，在这一时期饱受了“扫荡”、“烬灭作战”和经济封锁之苦，对日伪力量的仇视与日俱增，日伪政权实施的“政治战”、“思想战”显然是失败的，没有达到弱化中国抗战的民众基础的目的。整体而言，日伪政权的“治运”没有达到基本的战略目标。不论如何，日伪政权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不能脱离其侵略中国的大政方针而独立存在，根本目的不是要建立所谓的“皇道乐土”，而是要为彻底占领中国、支援太平洋战争服务的，其性质是非正义的，也是不可避免要失败的。

附录一：本书列出了战时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简明大事记。首次将“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以大事记的形式排列出来，清晰勾画

出日伪政权“治安强化运动”的全过程。

附录二：本书将散见于河北、山西、山东、北京、天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部分日文版的有关“治安强化运动”的珍贵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目录列于书后，以为有关学者参考。

本书主要的创新之处，一、以往的研究，对“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过程表述不是十分完整，多是以日本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几次大“扫荡”为例说明军事斗争残酷，以几个城市的“治安强化”、“献金运动”说明敌占区控制加强和对民众的无情剥夺。本书则在详实的资料基础上较为完整地概述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全过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二、以往较为重要的抗战史研究成果，几乎都要提及“治安强化运动”，将其看作是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但究竟包括哪些活动？其基本过程是什么？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民众的反应是什么？敌后国民党军及中共根据地政府、八路军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这些都在以往研究成果中涉及较少，本书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首次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分析。三、首次在有关“治安强化运动”的研究中引入历史心理学的概念，并试图以之分析“治运”期间各方心态的变化及其影响。四、首次对华北地区“治运”与华中地区的“清乡”运动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找出其异同点，并由此总结出华北与华中地区日伪政权在统治方式及规律上的特点。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研究的前提	1
一、课题界定	1
二、学术史整理	5
三、研究思路与重点	12
第二章 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	14
一、“长期战”下的华北政略	14
二、华北“治安”对策与实施	22
三、汉奸势力重组	27
四、拉启“治运”帷幕	33
第三章 “治运”过程概述	36
一、第一次：1941年3月30日~4月3日	36
二、第二次：1941年7月7日~9月7日	47
三、第三次：1941年11月1日~12月25日	67
四、第四次：1942年3月30日~6月中旬	79
五、第五次：1942年10月8日~12月10日	86
第四章 “军事战”：扩大“治安区”	99
一、“烬灭作战”	101
二、“集家并村”	116
三、“囚笼政策”	121

四、苦难人流	126	
五、暴行记忆	128	
第五章 “政治战”：巩固“治安区”		158
一、枪刺下的“自治”	158	
二、扩充训练自卫团	175	
第六章 “经济战”：掠夺与封锁		189
一、物资封锁	190	
二、掠夺性建设	203	
三、劳工输出	214	
四、合作社运作体系	222	
五、民众生活实态	229	
第七章 “思想战”：文化与教育的奴化		234
一、“大东亚共荣圈”的喧嚣	235	
二、伪新民会的变异	240	
三、日伪舆论的兴起	248	
四、奴化教育的实施	253	
第八章 “治运”与“清乡”比较		261
一、政策比较	262	
二、特征异同	263	
三、作用异同	267	
第九章 诸种心态的观照		269
一、日军：残暴与异化	269	
二、伪职人员：迷乱与苟安	285	
三、平民：恐惧与仇恨	290	
四、抗战人员：不屈与希望	294	
结语 “治运”与中日战争态势		297
一、华北抗战态势恶化	297	

二、中日双方压力变化	300
三、竭泽而渔必然失败	301
附录一 日伪“治安强化运动”大事记	304
附录二 参考文献举要	308
后 记	318

第一章 研究的前提

本章依据基本的学术规范，对研究对象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内容、过程、影响及意义进行较为系统的界定。全面清理 60 年来有关本课题的相关资料，客观评价相关的学术成果；简要归纳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创新之处及其学术价值所在。

一、课题界定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沿着“欲要称霸世界，必先占领中国；欲要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洲”的思路逐步展开。这一政策的具体化，即在土地辽阔的中国大陆，采取区域分割的方法，建立区域性伪政权，并通过伪政权实施其“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占领区政策。

在这一基本对华政策指导之下，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了伪“满洲国”（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华北地区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 年 12 月 14 日），在蒙疆地区（即察哈尔、晋北、绥远等地）先后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1937 年 9 月 4 日）、伪“晋北自治政府”（1937 年 10 月 15 日）、“蒙古自治政府”（1937 年 10 月 27 日），不久，三个伪政权合并组成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后改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7 年 11 月 22 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在华中地区成立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 年 3 月 28 日）。

各地的伪政权，均是当地日本驻军扶持起来并受其实际控制，但在利益与管辖体制等方面，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倾向，随着战事发展，各地日伪政权不可避免地会因政治、军事、经济等利益问题产生矛盾或冲突，形成各地日军及伪政权对日本军部及政府的命令与决策执行不一，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难以协调等诸多问题，对日本在华战争及占领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无力再发动较大攻势，退入大西南地区的国民政府坚决不降，中日战争被拖入日本政府最不愿意见到的长期战争态势。为了维持战争需求并寻求迅速结束中日战争机遇，日本政府一方面策反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潜逃，组建全国性的伪政权，协调各地日伪政权的利益，一方面要求各地日伪政权努力贯彻“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基本策略。

除了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由来已久，日本对其一直采取类似本土的特殊化政策外，日本政府及军部要求驻华日军，将各地的伪政权统统划归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以解决各地日军与伪政权间因利益纷争引发的矛盾与冲突。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设在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改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隶属汪伪“国民政府”管辖。

日本华北方面与华中派遣军因利益问题历来不和。华北方面军认为，由于要对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要持续不断地运出华北地区丰富的矿产与农业资源，以供应日本、太平洋战场及中国各地的需求，华北地区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上，都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然而，日本华中派遣军却以汪伪政权中央政府的权势与名头号令华北伪政权，事实上也在起着号令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作用。极度不满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汪伪政权的号令严重损害日伪在华北地区利益为由，要求日本政府特别注重华北地区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特殊性，给予华北日伪政权以特殊政策。尽管这一要求受到了日本华中派遣军与汪

伪政权的强烈反对，却获得了日本军部及日本政府的实际默认。1940年3月30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受汪伪政权管辖，实际上却在日本华北方面的支持下，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性质。

1941~1942年间日伪政权同时在华北、华中区域分别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是在中日战争进行到至为重要的相持阶段，日本在开辟太平洋战场前后所采取的重大政治决策。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综合手段，对中国占领区的华北及华中区域进行“治安强化”，巩固日伪政权的统治，彻底“肃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抵抗力量；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地区的矿产、农业、工业资源进行掠夺，并逐步实施对民众的奴化教育，以达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此一运动，在华北地区先称为“强化治安运动”，有时也称“清乡”运动，但最终统一称为“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地区则称为“清乡”运动。

1941~1942年间日伪政权在华北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既与此前日伪军事力量在华北进行的“治安肃正”，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也是日本“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在华北的具体体现与高度综合，除了“总体战”这一较为鲜明的特征外，“治安强化运动”在“军事战”上继承了此前“治安肃正”的残酷性，但又不再单纯依赖血腥、残忍的手段，而是通过实施保甲制度等措施，企图实现对华北民众的全面控制；以完整的治安体系，压缩中共力量的活动范围与能力，力求从根本上对以中共为代表的抵抗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通过经济投资进行经济掠夺，以供应太平洋战场及日本国内的急需；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政策，企图弱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从心理上根本解除民众对日本占领的持续抵抗。“治安强化运动”的这一特征，在1943年后华北日伪政权的相关政策上也表现出了连续性。

在“治安强化运动”实施期间，日伪在华北区域投入了大量兵